

## 第六章 結論

兩岸關係，從西班牙人、荷蘭人、鄭氏王朝、海盜、清朝、日本人到國民政府迄今，大體以製造台灣與大陸的分離，來做為控制台灣的基礎，自一九四九年兩岸的分裂至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更以兩岸的分離作為保護台灣的基本手段，在兩岸這種長久以來以「對抗為常態」的環境下，兩岸發展出不同的國家認同實在很難避免。台灣無論國家名稱及主、客觀上的疆域認定如何改變，不論是以建構論或是宣示論的條件看待，台灣都具有成為一個國家的完整形式，在兩岸長期隔閡並作你死我活政治鬥爭環境的影響下，台灣發展出異於中國大陸的國家認同更是難以避免的趨勢。

在兩岸特殊的國際地位下，台灣面臨大陸空前的政治、經濟壓力，兩岸關係的研究與處理，幾乎與台灣的生死存亡息息相關，兩岸關係的研究自然成為當前的「顯學」，而現有兩岸關係的研究，雖有外交史途徑(the diplomatic history approach)、分裂國家途徑(the divided nation approach)、理性選擇途徑(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菁英衝突途徑(the elite conflict approach)及不對稱政治過程途徑(the asymmetrical political approach)等五大類，但卻沒有任何一類將台灣國家認同分作制度認同、文化認同及族群認同三個環節加以討論，並依此討論作為研究兩岸關係的途徑者，更明顯的是台灣的國家認同內涵變化，對於兩岸關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這使得以台灣國家認同作為研究兩岸關係途徑的企圖，具有持續發展的前瞻性，加上國家認同的建構，常隨主客觀因素的變化而變化的特性，在不同時空環境及執政者的操弄下，台灣國家認同是趨向保持現狀，或趨向更統，或趨向更獨，實難預料，對兩岸關係的衝擊當然也因此而不斷的在變化，使得以國家認同為研究途徑的兩岸關係研究更具挑戰性。

兩岸經過長期分隔後，是否會發展為法律上的分裂，進而使得雙方人民堅持分裂，其關鍵不在於國際法或國內法的形式確立，如討論台灣的地位是否未定等，其關鍵在於分裂雙方的主觀意願，在民主開放的台灣尤其是指人民的主觀意願，而堅持分裂與否的主觀意願，顯然大部分由富政治意涵的國家認同走向所決定；本文將國家認同劃分為制度認同、族群認同與文化認同三個環節加以討論，必須是三個環節的總和才是國家認同的最終表現，但明顯的是，在現實環境中，一個族群可成立多個國家或多個族群可成立一個國家，多個制度可以用聯盟、加盟、結盟、聯邦、邦聯或其他方法成立一個國家或類似於國家的組合，一個制度也可分別被多個國家所利用與認同，一個文化當然也可以有多個國家，多個文化也可以成爲一個國家，顯然，要將制度認同、文化認同及族群認同三個環節的總和歸結成一個異於或同於其他國家認同的國家認同，必須要有特定的政治意念因素貫穿其間才得以完成，就猶如馬克思所指陳的「階級意識」讓「自在階級」轉變爲「自爲階級」一般，也如江宜樺對於國家認同的定義，認爲國家認同具有：一、政治共同體本身的同一性，二、一個人認爲自己歸屬於那一個政治共同體的辨識活動，及三、一個人對自己所屬政治團體的期待，或甚至對所欲歸屬的政治共同體的選擇等特性，<sup>1</sup>這些都必須要有政治意涵的因素貫穿整個認同過程，才足以塑造出有意義的國家認同。而台灣的國家認同，事實上是在統、獨兩大政治意念主導下，悄悄的進行著轉變。這才使得台灣的制度認同、族群認同及文化認同的轉變，可以代表當時國家認同轉變的一個環節，而不僅僅只是單純的族群、文化認同轉變或是政治制度安排的調整而已，而主導政治意念者，就是台灣自兩蔣以來各時期的政治領導人。

學者 Christopher Hughes 認爲，台灣在面對內部選民、國際社會及北京時，常有徘徊於選擇獨立或統一的「半國家」(intermediate state)困境，

---

<sup>1</sup> 請參閱第一章相關論述。

<sup>2</sup>而 Edwin A. Winckler 以另一個角度看，認為這種困境就是台灣始終被「一個個家」（以民進黨為代表的台灣獨立支持者所主張），或是如國民黨所主張的「台灣與大陸同是一個中國的一部份」問題所困擾著，<sup>3</sup>依據民進黨所代表的台獨支持者的主張，是要求台灣人民先確認自己為台灣這個國家的一份子，並追求與大陸分離為兩個國家的目標，依據國民黨為代表追求國家統一的主張是，早期要求台灣人民確認自己為涵蓋整個大陸與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的一份子，並致力於追求整個中國的統一，晚期則要求台灣人民確定自己是以台澎金馬地區為領土範疇國家的一份子，再視情況追求兩岸未來的統一或獨立，這種僵持不下的困境，不僅困擾著台灣內部，也困擾著兩岸關係的發展，而這種困境絕非一朝一夕所造成，在未能解決台灣內部國家認同分裂的問題前，這種困境也無法在一朝一夕之間解決。

對於獨立、分離等議題，Anthony H. Birch 則認為，要求分離獨立的正當性建立在如下的幾個原因上：<sup>4</sup>

- 一、長久以來要求獨立而一直拒絕統一的地區。
- 二、中央政府無力保護其基本權利與安全。
- 三、不能保護其政、經安全與利益。
- 四、主要族群以選票壓制少數民族的利益。

台灣與大陸的關係，到目前為止，其情境完全符合第二、三項有關中央政府（指北京當局）給台灣民眾的感受，尤其是在公元二〇〇三年七月初，香港五十萬居民走上街頭大規模抗議港府在北京壓力下，準備

---

<sup>2</sup> Christopher Hughes, *Taiwan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 152.

<sup>3</sup> Alan M. Wachman, *Taiwan -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New York: An East Gate Book, 1994), P. 9.

<sup>4</sup> Anthony H. Birch,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ntegration* (Boston: Unwin Hyman, 1989), PP. 64~66.

通過香港特區基本法二十三條有關箝制自由的法令後，使得台灣民眾增加對中共「一國兩制」有關承諾的懷疑；另外，第一項要求獨立的部分在台灣內部上有爭議，第四項未曾實施其結果無法預判，因為僅有兩項的「實證」，另兩項無法「證實」，所以，要求台灣獨立的正當性至今未完全取得，相對的要求兩岸統一的正當性，也由兩蔣時代的堅定，隨時間拖長及台灣內部國家認同不斷的改變而不斷的流失；台灣內部統、獨勢力的激烈競爭，在國家認同尚未轉變完成的情況下，台灣仍是處在追求獨立或統一十字路口的「半國家」尷尬位置，但是這種尷尬位置，卻會隨著國家認同的轉向（獨立或統一）而逐漸遠離。

自中華民國撤退來台，無論是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七一年的聯合國中國代表權之爭，或是一九七二年後一再宣稱不放棄中國大陸主權、不與中共接觸或談判，一九七九年後堅持「三不」政策，一九八一年主政的中國國民黨推動「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一九八七年開放探親，至一九九一年四月三十日李登輝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止，主政的中國國民黨均以「一個中國」做為推動兩岸關係的政策。之後，著手推動以「對等的地位」為原則的兩岸關係，其間有一九九二年公布「國家統一綱領」，八月通過關於「一個中國意涵」的聲明，陸委會於一九九三年九月、十二月針對中共「台灣問題與中國統一白皮書」所發表的反應文件，及一九九四年七月發表「台海兩岸關係說明書」等文，皆對「一個中國」做出了解釋。<sup>5</sup>這期間，中華民國政府的「一個中國」政策，所設定的目標又略有不同，蔣中正、嚴家淦及蔣經國時期，其目標著重在強調中華民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五〇年代至七〇年代初期，兩岸國際勢力雖已出現消長，但雙方都能接受共同指涉政治現狀的「一個中國」原則，但在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後，李登輝開始將重點轉移到在台灣

---

<sup>5</sup> 國史館編印，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台北：國史館，2001），頁4~5。

的生存關注，主政的國民黨政府，在「對等地位」原則下，開始出現「一國兩府」（未正式提出）、「一國兩區」（1990）、「一個中國、兩個對等實體」（1991）、「一個中國指向的階段性兩個中國政策」（1993）、「一個分治中國」（1997）與「特殊國與國關係」（1999），其中所呈現的是由「一個中國」原則，發展到「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最後推演到「特殊國與國關係」，<sup>6</sup>再到二〇〇二年陳水扁主政下的「一邊一國」更激進主張。這一系列的轉變，清楚地呈現兩岸關係在兩蔣時代兩岸互相堅持「一個中國」立場框架下，所呈現的「國內關係」，到李登輝「兩國論」將台灣的定位逐步脫離中國的轉折，再到陳水扁的「一邊一國」的兩岸完全獨立關係願景。

有論者認為，當前兩岸有關國家認同的闡釋，可歸納為四項：<sup>7</sup>

一、認同中共即中國的「一國兩制」模式，此為中共的一貫立場；  
二、認同中華民國即中國，此為過去台灣的主流立場，但在大陸持續壓制，在國際社會遭遇挫折後，此主張已相當微弱；

三、認同中華民國存在於臺、澎、金、馬的事實，現階段則是雙方自有事實主權，此一主張目前為台灣的主流立場。

四、自民族、文化和歷史的角度，看兩岸認同問題。

前三種認同均基於政治的統治意識，簡言之，就是兩岸制度認同異同的主張，異於第四項：自民族、文化和歷史的角度，看兩岸認同問題。若以第四項的角度—加入以民族、文化及歷史為考量的「族群認同」及「文化認同」，則兩岸認同的分裂，自又是另一種觀感。

國內學者吳乃德，依據 J. S. Mill 對於國家認同與民主鞏固的論述，引伸出現階段台灣國家認同與民主鞏固的問題，吳乃德認為當前的台灣

<sup>6</sup> 國史館編印，台灣主權論述資料選編（上），頁 6。

<sup>7</sup> 趙建民，兩岸互動與外交競逐（台北：永業，1994），頁 5。

是：<sup>8</sup>

一、國家認同的衝突讓公共政策的理性討論成爲不可能。

因爲國家認同的不統一，彼此間存在著敵意，因此任何一項足以傷害其中另一族群的公共政策，就會被敵對的族群強烈支持，使得公共政策的辯論不在於制訂完善的政策，而在作爲打擊另一族群的工具，所以，公共政策成爲了剝奪敵對群體的工具與爭鬥的交點。

二、「由於人民缺乏同胞的感情----社會終將欠缺民主政府運作所必要的團結一致的公共領域」，在台灣居民分別具有中國認同與台灣認同的情況下，不易在面對中國大陸壓力時形成共識。

三、在國家認同衝突的政治體中，民主的必要條件之一的「忠誠的反對」比較不容易存在。

因此，吳乃德提議解決國家認同問題，必須透過「民族運動」方式進行化解各類紛爭，其理由是：一、民族認同是一項人爲的工程，所以借用「運動」加以改變。二、目前台灣現況是中國認同快速的減少，雖然台灣認同沒有因此而增加。三、這種國家認同的變化，吳乃仁認爲主要是歷史因素促成，人爲操弄的因素不明顯。爲了加速台灣認同，就應該加強人爲的操作去塑造認同，<sup>9</sup>吳乃德期望在一段時間以後，讓台灣認同與中國認同分離，讓台灣民族完成形塑，並以台灣民族的認同爲基礎，進一步讓台灣的國家認同更強，達到與中國認同分離的目的，使台灣獨立自主的國家地位，長存於台灣人民心中；雖然吳乃德所強調的，是經由族群認同的轉變來造就台灣的國家認同朝台獨方向前進，其論述中有關國家認同建構部分，與本文所主張的國家認同分爲族群認同、制度認同及文化認同加以討論的情況雖有所不同，但吳乃德對於台灣國家認同的建立，可透過人爲的操作加速完成主張，卻與本文所論述一致。

<sup>8</sup> 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民主鞏固：衝突、共生與解決」，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1998），頁 25~26。

<sup>9</sup> 吳乃德，「國家認同和民主鞏固：衝突、共生與解決」，頁 28。

就如同 Benedict Anderson 所主張的，民族起於想像(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民族認同的塑造當然就是一項人爲工程，依此推論，包含民族認同或族群認同在內的國家認同，當然也是一項人爲工程，吳乃德認爲台灣可用人爲操作的方式，以「運動」的型態塑造台灣民族認同，就可以把台灣追求獨立的國家認同鞏固，並與大陸徹底分離，當然亦有學者認爲，既然民族建構是一項人爲工程，台灣民族也可能因各種外在變數的影響而重組或解體，<sup>10</sup>若然，則涵蓋民族運動的國家認同工程，也可能因人爲的因素而建構或解構，換言之，台灣國家認同不時在變，而變動的原因，卻是來自主政者的倡導、國際局勢的轉變與台灣主流民意的相互激盪，甚至是兩岸相互作爲手段變化的結果。所以，筆者認爲現階段台灣國家認同的建構，不一定僅能朝台灣獨立方向前進，若在領導者有意的操作下，國家認同的建構當然也可以朝統一方向前進，朝那個方向前進，極大一部份是憑藉著主政者意識，並挾龐大的行政資源所推動的結果。

依此推論，台灣在李登輝及陳水扁的台獨意識領導下，所從事有關制度認同、文化認同及族群認同的改變，確實會讓台灣與大陸分屬兩個國家的認同更加堅定，而現階段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方向正逐步走向台灣獨立，最終可能造成台灣的國家認同與兩蔣時代的傳統一個中國國家認同分離，反映在兩岸關係上，則是使台灣逐漸自「半國家」的尷尬地位脫離出去，並逐步將兩岸關係推向國與國關係的定位。

檢視從兩蔣時代到李登輝時代再到陳水扁時代的兩岸關係，發覺深深受到台灣內部國家認同變化的影響。兩蔣時期（尤其是在解嚴之前），兩岸基本上都視對方爲叛亂團體，不僅要將其平復，更意圖將己方的國家認同內涵（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強加諸於對方，因此，雙方

---

<sup>10</sup> 吳馭人，「民主化的弔詭與兩難？」，游盈隆主編，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頁 41。

無可妥協，必置對方於死地而後快，更重要的是，兩岸關係幾乎可以簡單的「國內關係」加以形容，兩岸更是在族群認同面上，以「中國人同蘇俄代理人的漢賊之爭」為爭論點，在制度認同面上，以「五權憲法法統同共產黨工、農、兵專制的制度之爭」為爭論點，及在文化認同面上，以「傳統中國文化興滅之爭」為爭論點，相互爭鬥絕不相讓，當時台灣同時以三民主義為所有認同的主軸，意圖在台灣建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將國家認同中的族群認同、制度認同及文化認同都與三民主義的建設糾結在一起，也以三民主義做為國家認同建構的張本，將久經日本人統治的台灣住民「去日本化」，並教育以一個中國認同，與大陸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作「零和遊戲」式的鬥爭，直到蔣經國晚期才做出務實的調整，兩蔣時期，在兩岸關係理論上早期是以「內戰理論」，晚期是以「同一性理論」作為面對大陸的基本態度，更意圖將這種思維推行於全球，企圖從國際社會中界定中共為叛亂團體或僅僅是政治實體（不是一個國家），同時使中華民國取得其意圖取得的國際地位。

在一九八八年李登輝接任總統後，繼承蔣經國時代兩岸關係的平穩，並在一九九〇年成立「國統會」宣示兩岸必將統一，進一步鼓舞中共緩和對待台灣，一九九一年成立「海基會」務實推動兩岸交流，為一九九二年取得「九二共識」創造兩岸歷史性的和解奠下基礎，但在一九九五年李登輝出訪，凸顯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並在一九九六年以總統直選進一步激化成台海危機，再到一九九九年提出「兩國論」，朝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方向邁進，造成兩岸緊繃；在李登輝時期，台灣因民主化與本土化的糾結，及國際社會日漸不利於台灣國際活動空間的拓展，使得台灣轉為逐步以務實的態度確認中華民國應有的、務實的國際地位，加上，民進黨以台獨主張挑戰李登輝政府，在李登輝主觀台獨意識及客觀國內、外政治局勢相互衝擊下，李登輝遂以「台灣必須是台灣人的台灣，這是基本問題」作為施政的核心，以「出埃及記」展示



脫離母國另創一個新的國家的決心，展開該時期內政、外交及兩岸關係的決策佈署。這種政策的推動，主政的李登輝，自然是以國家認同的逐漸轉變向台灣獨立，作為施政的最關鍵立場，以利於與民進黨搶奪選票，也有利於與國民黨內非主流勢力的鬥爭，相對的，在台灣主流民意逐漸轉向台灣獨立的國家認同後，若主政者李登輝的國家認同政策與作為，不能隨已經轉變的台灣人民國家認同觀念轉變，則在民主社會的台灣，就將無法獲取作多民意的支持而繼續執政，李登輝推動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各項政策也必然難以實現。

李登輝任內又以主政者的優勢，強化這種國家認同的轉變，使得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由過去一個中國逐漸轉變為台灣優先，或確認在台灣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衍生當然就是以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個政治實體作為基礎，並逐漸轉為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一個與台灣不相關的主權獨立國家，使得兩岸成為李登輝口中的「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此時期兩岸關係的理論運用是以「分割理論」作為基礎，影響所及，兩岸關係逐步傾向「國際化」、「友邦化」甚至「敵國化」發展就成為必然的趨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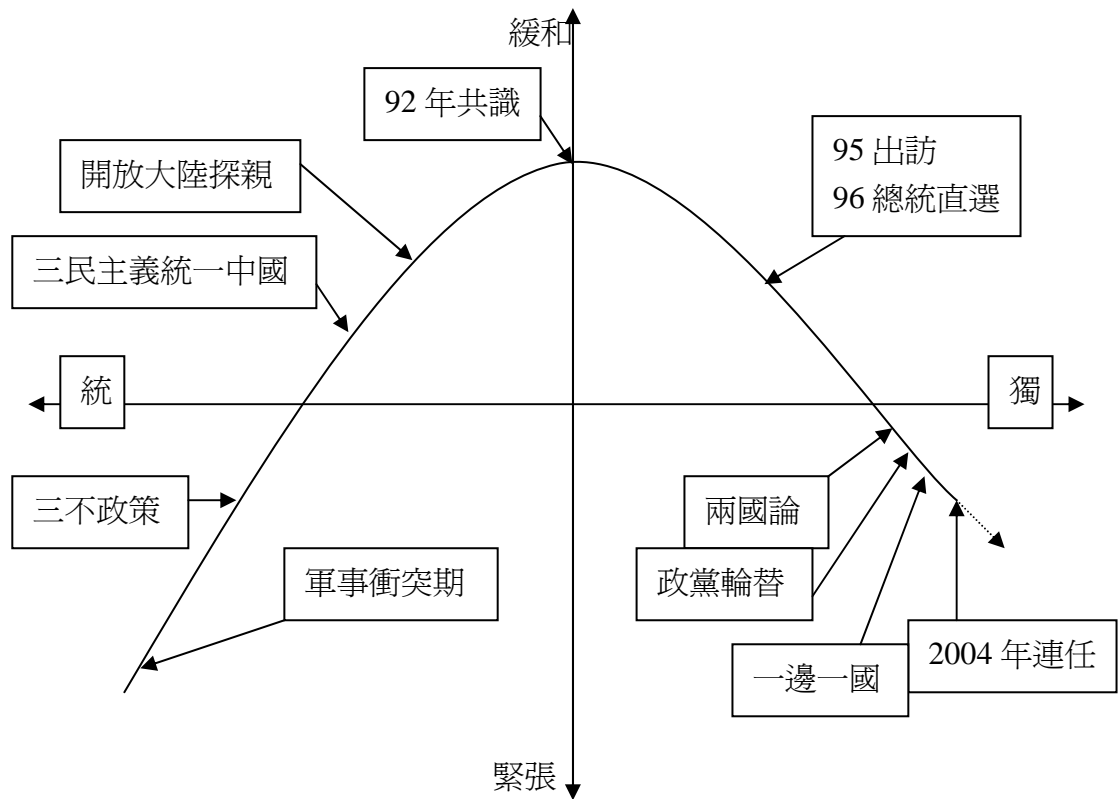
到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主政者陳水扁於二〇〇二年提出一邊一國論，二〇〇三年七月，尋求連任的陳水扁為即將來臨的總統大選，定調為一場「一邊一國對一個中國」的選戰和選擇，在二〇〇四年陳水扁連任成功後，顯然更加緊國內國家認同的轉變工作，其中啓用支持台獨的杜正勝出任教育部長，意圖在正式教育體系內推動國家認同的轉變，又啓用曾協助李登輝提倡「社區總體營造」，成功推動本土化教育的前文建會副主委陳其南出任文建會主委，意圖在社會教育體系中對台灣人民進行國家認同轉變的教化工作，及倡言修憲甚或制憲、新國家等就是明顯的例證，在國家認同更轉向台灣與大陸不相隸屬的兩個國家方向時，兩岸關係的理論運用顯已逐步進入「分解理論」時期，台灣的主政者視兩

岸為自傳統中國分解出來兩個對等國家，兩岸關係的呈現自然又與兩蔣及李登輝時代不同。

台灣國家認同轉變過程至今尚未完成，甚至出現以大福佬沙文主義壓迫台灣其他族群的情形，加上台灣內部各政黨間各自堅持意識型態的互動模式，使得台灣內部國家認同的紛紛擾擾至今未見稍歇，但整體國家認同由傳統一個中國向台灣獨立方向逐漸過渡卻是不爭的事實；在大陸以併吞台灣為主軸的對台政策不變的情況下，台灣不斷在尋求自我定位，並從自我定位出發所制訂的大陸政策，就成為決定兩岸關係變化的最重要因素，而在台灣已經民主化的狀況下，大陸政策的制訂卻又受台灣人民的國家認同傾向所箝制，這使得台灣國家認同的變遷結果，足以決定兩岸政策的起伏。

若將台灣國家認同的變遷，以一九四九年前後以軍事衝突互爭一個中國正統、一九七九年堅持三不政策、一九八一年國民黨推動「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一九八七年開放大陸探親、一九九二年國統綱領設立（同年也達成兩岸九二共識）、一九九五及九六年台海危機、一九九九年提兩國論、二〇〇〇年政黨輪替、二〇〇二年「一邊一國」及二〇〇四年陳水扁政府連任成功等事件，作為檢測台灣國家認同轉變的檢查點，再配合兩岸關係的緊張或緩和，或可以做出如下趨勢圖：

圖 6~1 國家認同與兩岸關係因果關係趨勢圖



由這個趨勢圖，可以發現，在一九四九年的兩岸緊張，達到最嚴重的軍事衝突時期，雖然比兩國論、政黨輪替、一邊一國及二〇〇四年的兩岸緊張程度為強，但其座落的第三象限，是以統一的國家認同為基礎的相互鬥爭，與國家認同轉變後，以獨立的國家認同為基礎的第四象限的兩岸緊張關係，顯然在質上是不相同的，而九二年的一個中國共識與國統綱領頒訂，營造了兩岸關係的空前緩和，這是基於一個中國國家認同基礎上，台灣對大陸政策不斷釋放出統一的訊息，造成兩岸關係的改善為基礎所造成，隨後因台灣國家認同朝台灣獨立方向不斷前進，兩岸關係也逐漸緊張，在二〇〇四年陳水扁連任成功，並宣稱是選民台灣主體意識的抬頭，更決定以公投為手段於二〇〇六年制訂新憲法，於二〇〇八建立新的國家（陳水扁在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日總統就職演說中，雖改口說在二〇〇八年卸任總統之前，能夠交給台灣人民及國家一部合時、合身、合用的新憲法，但以陳水扁及其所代表的民進黨所追求台灣

獨立的目標而言，其國家認同中的制度認同一環朝向台灣獨立方向，顯然並不會因陳水扁前後說詞不同，而與先前所宣布的二〇〇六年制訂新憲法、二〇〇八年建立新國家有所不同），<sup>11</sup>若依此國家認同不斷轉變趨向獨立一端所引起的緊張趨勢看，在中共不放棄武力犯台，甚至揚言不計代價解決台灣問題的情勢下，兩岸未來關係確有逼近如同一九四九年前後的軍事衝突的可能。

由這個趨勢圖，可以清楚的看出台灣國家認同變遷，對於兩岸關係影響的因果關係，其中，更突顯出在台灣國家認同的轉變過程中，若凸顯威脅中共的統治地位，則兩岸關係必然緊張的通則，如：一九四九年前後的軍事衝突期，及一九九五年以後李登輝主政下極力突顯台灣主權，國家認同朝向台灣獨立方向前進，並威脅及中共統治合法性時期，而在陳水扁接替李登輝為國家領導人及連任成功後，國家認同朝向更加獨立，更加威脅中共的統治合法性，而兩岸關係也愈趨緊張，反之，台灣國家認同內涵若不威脅中共的國家統治時期，如台灣開放探親，及建立九二共識時期等等，則兩岸關係有趨於緩和的趨勢，這種顯而易見的趨勢與因果關係，實有待台灣主政者加以重視，另外，在此必須附帶提出說明的是，這些「檢查點」的落點，是依據兩岸關係的趨勢推斷，不以量化為基礎，因此，落點的精確位置或有再討論的空間，但這種趨勢應該可以充分表達一九四九年迄今，兩岸關係受台灣國家認同變化的情形。

美國在台協會前主席白樂崎，於二〇〇二年六月十日，在台灣自由時報的《白樂崎專欄》中，以「台灣國家認同爭議，兩岸關係演變關鍵」為題的論述，更為本文國家認同轉變必然影響及兩岸關係的觀點，再一次表達了強有力的支持，白樂琦在該文中稱：<sup>12</sup>

---

<sup>11</sup> 請參閱：[http://www.president.gov.tw/2\\_special/2004\\_520/subject3.html](http://www.president.gov.tw/2_special/2004_520/subject3.html) 總統府網站。

<sup>12</sup> 該論述請參閱：<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jun/10/today-p7.htm> 網站。

「台灣自十餘年前展開民主化以來，國家認同缺乏共識，便一直是最具爭議的議題。雖然各政黨領導階層皆力圖避免在這個高度情緒化議題上發生衝突，國家認同仍然潛藏在表面下，成為影響多數議題辯論的因素。就兩岸談判所應保持的立場取得共識，一直是台灣領導人面對的最大障礙之一。----未來兩岸關係的演變，將會是『主戰場』完全移到台灣，----」

在此文中，白樂琦明白的表達了兩岸關係的「主戰場」是台灣國家認同的變遷，台灣國家認同的變遷將成為決定未來兩岸關係的最重要因素。

雖然國家認同變遷影響兩岸關係的論述，在本文中不斷的被加以證明，但其因果關係的表現方式，卻常被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所干擾，就猶如國內學者吳玉山對於兩岸關係可能發展所提的模式，認為：台灣這個小的政治實體，對大陸這個大的政治實體，進行抗衡或屈服於大陸的實力而扈從，有四個可能的結果出現，(一)、對兩岸關係而言，台灣對於中國大陸只有抗衡或扈從兩種選擇，這是在權力不對等和大陸對台灣提出主權要求的情況下所必然產生的結果，(二)、在兩岸經濟發展仍大的狀況下，台灣傾向於抗衡，(三)、如果美國支持台北對抗北京的壓力，則台灣抗衡的選擇更為明確，(四)、台灣內部不同的政治勢力，有些偏向支持抗衡，有些偏向扈從，這些政治勢力的主張，都在反應台灣社會所受經濟與國際因素影響後所呈現的狀態。<sup>13</sup>這充份說明經濟因素，決定台灣有無能力抗衡中共，或可進一步說明經濟因素決定美國是否支持台灣，更說明經濟因素左右台灣內部政黨有無決心與大陸抗衡的狀態。

中共自十六大以來，北京對外強調共同發展，對內追求小康社會，對台主張和平解決，顯見對抗、鬥爭、意識型態應非當前大陸對台政策

---

<sup>13</sup> 吳玉山，「台灣的大陸政策：結構與理性」，包宗和等著，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台北：五南，1999），頁 164。

的主流思想，<sup>14</sup>自中共十六大以降，中共對台政策戰略所呈現的新局面，有學者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加以形容，所謂「一個中心」是指中共以本身的「經濟發展」做為解決台灣問題的中心，而「兩個基本點」是指「穩定中美關係」與「作台灣人民工作」兩項。其中，北京認識到解決台灣問題的根本在於台灣民心的向背，台灣民意不僅是決定統一與否的關鍵，同時也是制約陳水扁政府邁向台獨的保證，所以中共越來越希望藉由做好台灣人民的工作，以達成「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的目的。<sup>15</sup>這種戰略作為，凸顯中共以國際關係架構框住台灣，讓台灣在無法獨立的先決條件下，再以經濟實力及台灣對大陸不斷加深加廣的經濟依存度，進一步將台灣融入大陸社會中，用時間來轉變台灣對一個中國的認同，達成中共「統一」台灣的目的。

可以大膽預測的是，在可見的未來，人類先求生存的渴望仍會明顯高於求理想的渴望；若中國大陸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程度持續增加，這種求生存的現實，將代表著台灣必須依附中國大陸才能生存，其重要性比起台灣國家認同提倡的理想要高，以致於現階段台灣國家認同程度雖不斷的在加強，但在兩岸關係中的呈現，卻被經濟、生存等現實問題逼迫而隱晦。換言之，在現階段強調台灣的國家認同，雖在與中共的對峙上能發揮一定的堅持效果，但在國際現實環境的箝制下，似乎也無法於短時間內實現台灣獨立的夢想。

在時序進入公元二〇〇〇年後，大陸經濟日盛，美國在中國大陸以大國外交的格局牽制下，對台支持亦多有顧忌，台灣對大陸扈從的趨勢陡增，而強調台灣獨立的國家認同，已經不得不成為「弱者的唯一武器」，兩岸關係發展至今，猶如，中共以國際政治這個強有力的材料，編織成牢籠將台灣困住，不讓台灣脫離出去，但被困住的台灣，到底是個容易

<sup>14</sup> 蔡瑋，「兩岸近期各釋善意，穩中促變」，聯合報，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八日，版 15。

<sup>15</sup> 童振源，「辜汪會談十週年前夕展望兩岸關係」，歐亞研究通訊（台北），vol. 3, No. 3, 2003，頁 10。

被馴服的「兔子」，或表面可以被馴服但卻隨時伺機從中獲得好處的「狐狸」，還是深具危險性的「老虎」，就取決於台灣內部國家認同的變化，而中共卻又企圖透過經濟因素這根「魔棒」予以牽制、主導，企圖改變台灣國家認同對於兩岸關係表現的影響極其明顯；在實際運作層面上，中共既然可以用經濟因素影響台灣國家認同變遷方向，中共當然也可以運用其他因素影響台灣國家認同的變遷方向，如中共對台釋出善意或敵意，就明顯影響及台灣民眾對於大陸敵意或善意的觀感，進一步當然也影響及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未來走向的選擇，而逐漸影響及台灣人民對於國家認同的形塑，這現象顯然表示台灣國家認同的形塑與變遷，是與大陸對台的作為與反應有密切關係存在，但在本文中，是將中共對台策略假設為不變，僅考慮台灣國家認同變遷對於兩岸關係的因果關係，雖與現實面未見完全吻合，但以中共對台立場不變作為研究的假設，卻可以收到研究單純化與脈絡清晰化的結果，更何況，中共的對台作為雖然多變，但卻始終不脫離將台灣納入其主權範圍內為企圖的主軸，對台作為的變動僅是對台的手段而已，而這種手段的變化，僅僅是在台灣政治領導人所主導的國家認同變遷過程中的一種助力，所以，在排除影響國家認同的助力狀況下，假設中共對台政策不變，而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變遷影響成為兩岸關係的自變相，應該是可以被接受的研究假設，而且在不考慮國家認同變遷形成過程中的中共一方助力，僅考慮台灣主動於國家認同形成結果的過程與結果，在研究脈絡上暫時排除兩岸互相作為與反應對於台灣國家認同的變遷影響，並不會影響及兩岸關係受台灣國家認同變遷影響的研究成果，若要進一步細分中共對台作為（手段）變遷，對台灣國家認同變遷走向的影響，應可以成為另一研究課題，詳加研究。

證諸兩蔣時代、李登輝時代及陳水扁時代，以執政者的立場而言，對內，台灣國家認同的走向將決定其統治的合法性，如兩蔣時代大體以

收復大陸治權為施政主軸以獲取民心，李登輝時期與陳水扁時期，卻逐步以與大陸分割成兩個國家作為施政主軸，以獲取民心及統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對外，則國家認同決定兩岸關係的發展已如前述，兩岸相互釋出善意或惡意，雖足以成為台灣國家認同變遷的助力，並多少影響及台灣國家認同轉變的方向與速度，但當前影響台灣國家認同變遷方向與速度的各類因素中，最明顯且具決定性的卻是經濟因素，經濟因素已然成為當前台灣國家變遷與兩岸關係因果關係中的重要干擾變相，但不論這個干擾變相如何干擾，國家認同的問題，實攸關台灣人民願意以何種態度面對與中國的未來關係，因此，在現有及未來，對於兩岸關係理論建構的過程中，或意圖以國家認同途徑作為研究兩岸關係的重要途徑（approach），或意圖在現有理論中加入其他更應該考慮周延的因素，則「台灣國家認同變遷」就不得不佔有最重要的位置。